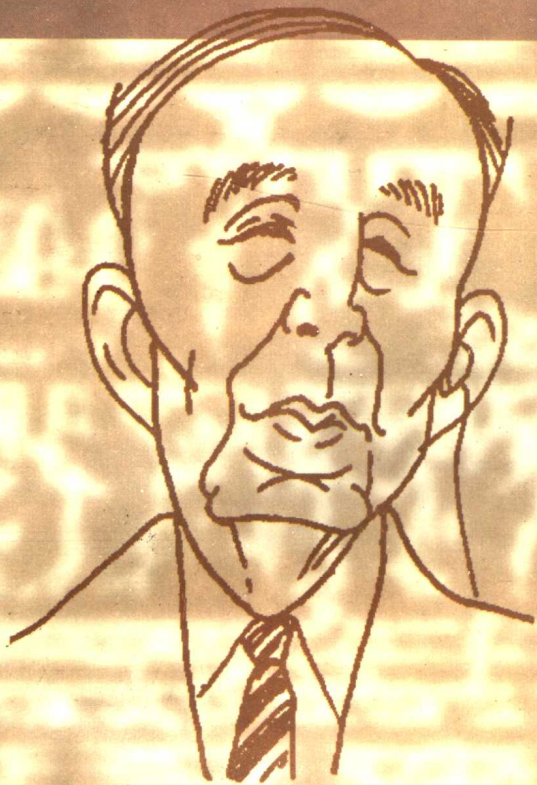


○ 王晓清 /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 王晓清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王晓清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16-02954-2

I. 学…

II. 王…

III. 史学流派—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K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307 号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王晓清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39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120

定价:17.30 元

书号:ISBN 7-216-02954-2/K·318

导 言

感怀与沧桑、光荣与梦想交织的 20 世纪，随时光的流逝已渐渐地从我们期待的视线中消隐了。100 年的风云扰攘，100 年的学术喧嚣，顷刻化皈宁静、恬淡，兀然矗立的学术精英似乎是百年中国文化的风之响铃，在一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中撞击出清脆、激越的阵阵清音。是学术精英，以自己的天才与智思，创造了一个世纪思想、文化的繁荣；是学术精英，在一个民族沉睡之时，握紧人文精神之魂，于旦危暮亡之秋振臂而起，维系着古老民族的内在根脉。我们在追寻 20 世纪中国史学变动不居的发展轨迹时，不由得为一代代史学大师“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襟与宏阔气度所折服。时代风会所寄，学术终有归诣。遨游学术殿堂的大师，总是以自己的坚苦励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加压的道义与正义叠构的重任。学术良知在一次又一次地规范着学者的行为、操守。“出仕”情结与“不朽”精神，似一柄双刃剑，在诱惑着历史学家在时代挑战面前艰难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价值重估。

20 世纪中国史学，在 100 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学术努力，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基本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说自立，朴学与理学并倡，史观派与史料派互长，专家与通人彼此渗透，史学旗帜在理论亢进与矜慎考据中蹒跚进

步的学术格局。学术风气是学术进步的路标，而树立这一路标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人。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群体凭藉自己的著作形态、研究方式、学术规范甚至个人的生存状态，在时代的学术风气中自树一帜，反过来又深刻地推动或主导着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学术风气积习而孕成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而将不同时代的史家裹挟前行的，是时代绵绵延展的学术思潮。“但开风气不为师”与其说是一个史学家垦拓学术新领域的精神力量，还不如说是时代学术思潮的某种预示。

生命的延续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时代，同样地，学术的传衍反哺了一代代气韵勃发的史家英才。无论是才华横溢的学者，精深独进的专门家，还是大气贯虹的通人，都不可能平地而起、自我为尊，而总是具有历时性的。学术的师承授受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而且很有必要了。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所谓“能者为师”，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但潜涵其中的重师严教的文化意蕴是呼之欲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经典名言，透视出学术传衍与师承接受系统是牢密不可分割的。百年史坛的学术谱系中，“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学术现象是很普遍的。按照清代史学名家章学诚的说法，“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所以，师承之与学术的关系至深且巨。史学宗主以其学养与识解，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或开辟新式学术区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门户。而继起学者，在师门业已建构的学术基石上，进一步索隐探微，求真创新，就能将学术精魂发扬光大之。反之，如果谨守师承，拘泥师说，回护师门，就不可能对学术有所发明。学术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步步为营，更没有必要自牖门户之见，形成学术研究的固步自封。所以在百年史坛上，我们注意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守师承而不拘执师门的现象。章太炎之于业师俞樾的《谢本师》，周作人之于业师章太炎的《谢本师》，以及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脱离师生关系，是从政治理念上宣布

断绝师傅与生徒的关系，而在学术的接受系统上是不可能以一纸声明为决断的。

崛起于百年史坛而首执学术牛耳的史学隼才，人人皆有师。将历史学家的师承渊源，师门户限，师友关系，同门同调，学倡所自，一一厘清析明，不啻是一部世纪历史学家学术叙谱。事实上，作为以学术生命所寄的史学家，是在一个特有的人际关系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的。史家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研究时，他的学术起点可以追溯到师门传授的起始阶段；而在研究过程中又不可能空穴来风，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凭藉而颇收师友切磋之益。没有胡适之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钱玄同的怀疑今古文经，就不可能有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没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就不可能有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更不可能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如果不是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创导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风气，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胡绳、吴泽、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无由以崛起。师承与家法在专门史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洪钧、沈曾植、屠寄、柯凤孙专注于蒙古史、元史，极其深刻地推动了陈垣、陈寅恪、韩儒林的“不中不西之学”的研究；缪荃孙、傅增湘、张元济诸人的版本目录之学，将现代中国的传统学术推向了一个极致，其间的继承与发展的脉络可以分划得一清二楚。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柳翼谋的《历代史略》崇尚的是一种贯通博识的学术气象。撰写中国通史不免被专家讥评为抄袭，但由夏曾佑首发其端的以章节体撰写中国通史，却吸引了一批苦志励行的继起者。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一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除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之外，其他人的通史著作太抵是由大学讲义改编而成。共和国时代，中国通史的撰写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即以著名史家为主编，集体撰写。郭

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概莫如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虽说是以一人之力在撰写，但也没有最后告竣，以《中国通史》面目出现的范著，仍然是由范的弟子集体协作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师承关系在学术的传衍中的功能是巨大的。

历史学家是时代的骄子，是学术的弄潮儿，更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史家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学术潮流所淘汰、所淹没。所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著名学者胡适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的日记》，第 440 页）应该说，胡适的学术判断力还是准确的。只不过对章炳麟的评判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因为此前章炳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批评。没有师承的钱穆 60 年代在评判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家时，不隐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说近人论学，章太炎最有轨辙；梁启超有生意，有浩气；陈垣不矜才，不使气；王国维其病在不尽不实；陈寅恪故作摇曳，临深为高；胡适之持论多病（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 230～231 页）。在钩稽百年史坛的发展脉络时，历史学家的自我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师承与家法是学术进步的阶梯。家学渊源是一名史家成就学业的很关键的因素。所谓庭训早启，所谓书香门第，无一例外地说明家学的重要性。甚至有这种学人现象，父子、兄弟学术相承继，皆为学术名家，他们的学问似乎不待旁求。张相文、张亮尘和马宗霍、马雍是父子关系，皆为知名的学问家；容庚、容肇祖是兄弟，一是古文字学家；一为哲学史家，冯友兰、冯沅君是兄妹，一是哲学家，一为文学史家。家学渊源有自，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是显著的，也是重要的。

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准备撰写“元代关学研究”

的学位论文时,翻阅了不少宋代理学的史料,其中《伊洛渊源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觉学术师承与门户之见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在阅读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时,对黄氏梳理中古学术史的独特方法发生兴趣。后来读到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觉得从家学渊源与师承授受的角度研究 100 年的历史学家群体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着笔撰写本书时尽量不从人所共知的学术贡献上下手,也力图避免作政治性评判,试图从钩稽师承关系、师门户限、师法家法的角度,用轻松活泼而又不失学术特性的笔调道出史家学问的渊源。因为资料的限制、时间的制约以及作者学识的欠缺,书中不妥贴之处是存在的,祈读者诸公鉴之。

目 录

导 言	1
执守穷经慰空灵——杨守敬学记	1
解钥朴学真谛——孙诒让学述	8
述而不作亦通儒——沈曾植学记	14
断代为史传精神——柯凤孙学记	19
现代蜀学第一人——廖平学述	24
传古·考古·证古——罗振玉学述	30
博学·博通·博大——张元济学记	38
烛照幽隐注青史——孟森学记	46
唯有渊深是国学——章太炎学记	53
“新史学”急先锋——梁启超学记	61
“民国隐士”——黄节学记	69
“新史学”开山祖——王国维学记	74
通知今古,返本开新——柳诒徵学记	82
步武乾嘉,开代学风——陈垣学记	89
通史家风余韵长——吕思勉学记	98
恢诡偏执务绝学——黄侃学述	107
偏激偏执不偏见——钱玄同学记	115
通史·通识·通人——邓之诚学记	123
大师其大——陈寅恪学记	131

开代风气转多师——郭沫若学记	140
各不依傍,自成家派——胡适与范文澜	153
“贪多务广”亦孤独——顾颉刚学述	166
入以国粹,出以西学——洪业学记	174
心犹余憾洗铅华——钱穆学述	183
大气淋漓最是真——傅斯年学述	191
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李济学记	199
两部通史,一种理论——周谷城学述	208
其学可感,其风可慨——郑天挺学记	216
访书·寻书·著书——谢国桢学述	223
不中不西之学——韩儒林学述	231
最是理论艰深时——侯外庐学记	240
辽史三大家——冯家昇 傅乐焕 陈述	247
以“新宋学”是务——邓广铭学述	254
双峰并峙因其大——吴晗与罗尔纲	259
悠悠长水铭斯人——谭其骧学述	272
为往圣继绝学——胡厚宣学记	280
跋 百年史学:学派蠡测	288
参考书目	295

执守穷经慰空灵

——杨守敬学记

用“前清遗老”这个名词术语是不可能概括杨守敬晚年的学术研究精神的。8次科举不中程式,直到48岁彻底摒弃功名,杨守敬(1839—1915),这位湖北宜都的小商人之子“自是始绝意科名,专心著述”。古人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事业在杨守敬的精神世界里只能退而求其次,朝“立言”这个领域发展了。微而言之,即在历史沿革地理、古籍版本、碑石铭刻等方面执经问难、冥搜潜索、自成统系。杨守敬年近半百作出“专心著述”的决断已是在20世纪的前夜。如果没有科场功名上的挫折,有清一朝自顾炎武、胡渭、顾祖禹创通条例的地理学就断断乎不会在杨守敬这里形成汪洋恣肆、淋漓总汇且集大成的学术格局。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推赞“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大成”^①。

杨守敬是晚清历史地理学的巨擘,与杨同时代且有相同志趣的罗振玉将杨守敬的“地理学”、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推尊为清代三“绝学”。遗憾的是直到杨守敬以77岁高龄在民国4年(1915年)辞世,这位“常以名山之业为念”的邻苏老人也没有看到自己与弟子熊会贞(1863—1936)撰著的《水经注疏》的出版。朝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代鼎革之际，古稀之年的杨守敬间关夺隘，惊恐中到上海避难。虽然无资力做“海上寓公”，但依托鄂籍名宿柯逢时、旧友梁鼎芬以及沪上学人的资助，“嗜古成癖”的杨守敬始终没有忘情于《水经注》的研究。“卖字为活”以及替他人鉴赏碑版、古书，题写跋记的同时，杨守敬一直在做《水经注疏》的修订工作。“发篋与会贞详核，每一卷成，犹恐有误，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订或通宵”^①。杨守敬向黎元洪写信说自己“濡滞沪上，卖字为活”，并请黎副总统将《历代地图》“飭下各省学堂为地理教科书”，同时向这位鄂籍旧友诉说《水经注疏》30年著述“无间寒暑”的艰难。向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写信，谓自己“钻研故纸，尤好地学”，婉转请求政府资助《水经注疏》的出版，后民国政府“赠以刻《水经注疏》贰佰圆”。杨守敬向段祺瑞、赵尔巽、周树谟等政界要人写信求援，无一不是希望他们在《水经注疏》刻版上予以圆通。

与此同时，杨守敬与当时的“海上寓公”和学界名宿书信往还，在“遗老文化圈”不遗余力地推介自己未出版的著作。与远在日本的金石、版本学家罗振玉信函往返，商及《水经注疏》的雕版事宜，具体到刻工的字价、版式的选择。为了尽早成书，杨氏不惜将自己收藏几十年的珍本图书给罗出版。给湘中名儒王先谦写信，恳请这位老友在湖南永州觅价极廉且精的刻手。因为与王近30年未谋面，杨氏不厌其详地向王先谦介绍《水经注疏》的撰写进程并赠送自己已出版的著作。杨守敬北上做民国政府的参政，不惜以垂暮之年更事新朝，背上一个被前清遗老唾弃的骂名，原因只有一个，即在风烛残年将自己呕心沥血30年的《水经注疏》雕版问世。他在与友人的数十通信函中，在与弟子熊会贞的谈话中，一再说“此书不刊行，死不瞑目”。

^① 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一册，第2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杨守敬立下宏愿研究《水经注》，此前已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为《水经注》的总结性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著《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水经之源；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水经世系；著《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水经原委。煌煌巨著《水经注要删》出版之后，为杨守敬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当时学者名士如潘祖荫即推重他的研究是“旷世绝学，独有千古”。《水经注要删》实际上是杨守敬研究《水经注》这一浩大工程前期学术成果的体现，对于该书的刻板，杨守敬本人确实表现出很强的学术自信力。他在《水经注要删》的《自序》中说：“自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友人陈衍在《杨守敬传》中说他“生平敝精力为《水经注》一书，举全、赵、戴诸家谬误，摧陷廓清，无所于让”。杨守敬亦认为他与弟子熊会贞发愤著述《水经注要删》在“考古之力”上有超迈前贤的建树。

中国传统地理学领域，河道水系的经典著作是汉代的《水经》，而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更是卓绝千古的地理学名著。明代晚期迄清朝前期，《水经注》的研究成为学者着力的“显学”。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家在《水经注》上用力最深的是离析经与注，从古籍版本的角度将经、注加以比对校勘、订正讹误，进而整理出一个学术界可以接受的本子。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始治《水经注》；乾隆时《水经注》研究成果蔚然。戴震披图览册，亲履实践，将本经与注文剖分得一清二楚；全祖望遍访天一阁，日读《永乐大典》，七校《水经注》；全祖望弟子赵一清继承师说，辨验文义，离析经注，成《水经注释》40卷；淹通群经的沈钦韩鉴于戴震臆断《水经》，赵一清苛于轻信，反复搜讨，撰写成《水经注疏证》40卷。直到同治、光绪时期，《水经注》作为传统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仍然受到考据学家、汉学家的普遍重视。这是杨守敬矢志研究《水经注》的学术背

景以及当时《水经注》研究的新趋势。《水经注要删》的出版按照杨守敬的说法,一是担心“又增一赵、戴之争”,二是该书“大抵考古为多”,“其脉水者为略”。因此杨守敬仍然不满意,与弟子继续潜心著述。在杨守敬生命的最后时刻,《水经注疏》仍在纂辑、疏证、校理之中。杨氏临终前将该书托付给熊会贞,并嘱咐家人分年谷 80 石为熊的衣食之资。熊会贞铭记恩师遗嘱,“无间寒暑,志在必成”。经过 22 年的努力,“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略已粗定”。熊会贞关于《水经注疏》的校订工作实际上并没有最后完成,他写有《补疏水经注疏遗言》39 条。熊氏校补《水经注疏》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京都研究所派遣松浦嘉三郎来武昌,欲以重金购买《水经注疏》原稿,遭到熊会贞严词拒绝。后来,杨氏后人暗中将稿本卖与他人,熊会贞郁郁寡欢,自缢而死,与稿俱逝。民国 25 年在熊会贞弥留之际,熊的枝江同乡、燕京大学研究生李子魁(1907—1983)受托从事《水经注疏》稿本的补订工作。熊会贞一介寒士,显然无力将《水经注疏》雕版印行。为了阐扬业师地理“绝学”的功绩,熊会贞在顾颉刚主办的《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关于〈水经注〉之通信》,向学术界介绍《水经注疏》的最新进展。但《水经注疏》始终是以稿本的形态存在着的。以后《水经注疏》的正稿本由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带往台湾,台北中华书局将其影印出版。50 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手中购买到熊会贞生前写订的、由同一书手抄录的《水经注疏》副稿本。据徐行可介绍,《水经注疏》副稿本在他手里经历了一个很艰难的时期。武汉沦陷之前,徐氏即购得了这部《水经注疏》副稿本;武汉沦陷以后,日本人探知该稿本藏身徐家,百计搜求。徐行可顶住日本人的压力,百般回避,使《水经注疏》副稿本始终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从徐氏增补该稿本的“汝水”内容来看,藏书家徐行可对《水经注》研究并不外行。徐行可是鄂籍著名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黄侃死后,徐行可还为黄氏出版了遗著。该稿本 1954 年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魏晋南北朝史专家

贺昌群撰写了《稿本〈水经注疏〉说明》，对该稿本和杨守敬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不无巧合的是，几乎是在《水经注疏》稿本影印出版的同时，在中国史学界成立了以吴晗、范文澜、谭其骧等为主的“重新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任务是编绘一部《中国历代地图集》，以供毛泽东读史之用。由此可见，杨守敬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在建国初是十分受重视的。

杨守敬的历史地理“绝学”基本上是他自己体会出来的。杨守敬对历史地理学发生兴趣是在他的青年时代。20岁时，杨守敬从浙江余杭籍学者郑闾所晒书中看到著名舆地学家六严绘制的《历代地志沿革图》。因为郑只有一部，杨守敬将其借回家抄写影绘。他不分昼夜，“无间昕夕”，影绘了二部。《历代地志沿革图》在青年杨守敬的精神世界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它对杨守敬献身历史地理研究有怎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杨守敬在他的自传《邻苏老人年谱》、《晦明轩稿》、《留真谱》、《水经注要删》等著作中都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影绘《舆地图》对青年杨守敬偏好历史地理的启蒙作用是深刻的，他把一生的精力与心血花在地学领域，显然是与他年轻时代的志趣紧紧相连的。杨守敬的舆地志研究可以说是无家学渊源，无师承授受，也没有收师友切磋之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精研文献、穷搜极索、体悟会心的结果。对杨守敬来说，无师承授受是显而易见的。这有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乾嘉以迄同光的近300年，湖北基本上没有出现驰名全国的大学者。经济欠发达，南北交冲而战乱频仍以及本来缺少文化氛围，这应该是制约晚近湖北学术大家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杨守敬在给王先谦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楚北士人，早无师承；新既不溯，亦无旧之可言”。

杨守敬并不仅仅是一名地理学家，他在版本目录学、金石碑铭、书法等领域也卓有成就。这些领域的成就又促使杨守敬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形成精深独进、大气磅礴、自成师法的博大的学术气

象。例如,杨守敬撰写过大量的碑记、墓志铭、金石拓片的跋语。这些考证性的跋语实际上是一篇篇历史或地理学科的学术论文。许许多多的跋语涉及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历史片段和方輿地志。专精金石学,使得杨守敬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融会贯通、纵横捭阖而游刃有余。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杨守敬研究历史地理所仰赖的完全是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微而言之即是乾嘉诸老的朴学方式方法。杨守敬无师承授受,并不是说他做学问就没有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路线。杨守敬在青年时代即有机会得以闻江浙诸老治学的余绪。乡贤谭大勋曾馆于江都学者汪孟慈家,而汪孟慈是著名经学家汪中之子。汪氏父子学殊赅博,亦精通輿地之学。杨守敬 19 岁时从谭先生口中知悉前辈学者做学问的功夫,在《邻苏老人年谱》中他深有感触地说:“盖守敬得闻国朝诸儒之学自此始。”在杨守敬涉及的学术文化圈子,有一批各有专攻、贡献各殊的学者通家。缪荃孙、张元济、罗振玉在版本目录学、古史考证上与杨氏有共同的嗜好,能收师友切磋之益;沈曾植、王先谦精通輿地之学,直接给杨守敬以启迪。梁鼎芬、柯逢时、周树模等也给杨氏做学问以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有清一代边疆史地特别是西北史地研究,成为清朝地理学研究的一个主导性学术思潮。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将研究视域集中在西北边疆史地上。杨守敬以《水经注》为本而不趋时逐新,很显然,他的历史地理研究代表了自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沿革地理的主流方向。甚至可以说,杨守敬是清代地理学研究的终结性人物。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杨守敬”列名“地理学家列传”最后,说杨氏輿地学“千古绝业”。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谓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颇为朱谋玮讼直,而不肯作赵、戴輿台”,“此亦乾嘉以来一反动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评述清人地理学研究时,谓杨守敬的《历代地理沿革总图》“其绘制之精确,篇幅之宏巨,实属本期不可多得的佳著”;“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大成,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晚清迄民初的国学

大师章太炎亦很是推重杨守敬的地学研究。在日本东京时，章太炎对即将回国省亲的友人黄侃说“务学莫如求师，环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章太炎向黄侃说“君乡人杨惺吾（杨守敬，字惺吾）治舆地非不精，然察君意实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孙诒让，字仲容）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①。由此可见，章太炎对杨守敬的地理绝学是十分推崇的。

杨守敬集清代 300 年来之大成的《水经注》研究，并没有终结对《水经注》做更深入的研究。在杨氏辞世以后，研究《水经注》最力且取得成就较大的，当推王国维。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前后，王国维撰写了不少关于《水经注》的跋语。王氏是从版本学的角度评判《水经注》校勘学史上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他从藏书家蒋汝藻、傅增湘、沈曾植诸人手中得到了许多珍本秘籍的，有不少是杨守敬没有寓目的版本。胡适是继王国维之后研究《水经注》最有成就的学者。胡适研究《水经注》的机缘完全是针对王国维的。王氏认定“戴东原窃案如山”，胡适不服气，立志为他的乡贤翻案。因为是大学者、大名人，胡适很快收集到许多很珍贵的《水经注》的版本。1948 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还举办过“《水经注》版本展览”，一共展出各种版本的《水经注》9 大类，41 种。胡适为戴东原鸣冤白谤，虽有版本学依据，但在郾学史上亦是仁智互见，没有定论。真正接续杨守敬《水经注》研究的则渺有其人。纯粹从河道水系上钩稽爬梳、正本清源需要有深厚的历史地理学的功力。随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确立，杨守敬所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研究也渐渐被历史尘封了。

① 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黄侃纪念文集》，第 177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